

中国启蒙思想文库

张岱年 主编



中国启蒙思想文库

尊隐	大同书
默觚	仁学
采西学议	建国方略
使西纪程	砭旧危言
弢园文录外编	
筹洋刍议	恤书
盛世危言	新民说
论世变之亟	猛回头
新政真诠	睡的人醒了
强学—戊戌时论选	
民声—辛亥时论选	
新潮—民初时论选	

弢园文录外编

王 韬 著
楚 流 选注
书 进 雷
风 雷

· 中国启蒙思想文库 ·

弢园文录外编

王 韬 著
楚 流
书 进 选注
风 雷

辽宁人民出版社

1994 年 · 沈阳

(辽)新登字1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弢园文录外编/王韬著;楚流等选注. —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6

(中国启蒙思想文库/张岱年主编)

ISBN 7-205-02866-3

I. 弢…

II. ①王…②楚…

III. ①政治思想-思想史-中国-近代②政论-中国-近代-选集

③王韬-文集

IV. D092.5

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和平区北一马路108号 邮政编码110001)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朝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字数:266,000 印张:14 $\frac{1}{8}$ 插页:5

印数:1—1,591

1994年9月第1版

1994年9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张富娟

责任校对:安丽君

封面设计:赵多良

版式设计:赵耀今

定价:14.70元

“中国启蒙思想文库”总序

在历史即将跨入 21 世纪的时候，辽宁人民出版社推出了这套“中国启蒙思想文库”，无论从哪个角度看，这都是件极有意义、极值得称道的事。

尽管这些著述原是撰写于 80 多年以前，它的作者也和那个时代一起早已成了历史的陈迹；但是当人们重新翻阅这些古色斑斑的书页时，仍然无法轻松和平静。这是启蒙先驱者们的呐喊和沉思，它激昂、悲壮而又深沉无比，仿佛融进了多少代人的希冀与渴望。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的启蒙者和中国的启蒙运动为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写下了最为辉煌又最为感人的一章。

它发生在中国大封建王朝彻底崩溃的前夜。这是一个前进与倒退、光明与黑暗、希望与失望交织的时代，亦是近代中国社会一个大转变的时代。那时，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都已落在西方现代文明的后面，国内矛盾重重，国外列强环伺。自 1840 年的鸦片战争始，帝国主义的坚舰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国门之后，中国就被推向了备受屈辱和更加不幸的境地。但是，帝国主义侵略者的坚舰利炮并没有把中国人吓倒，相反却进一步唤醒了中国人民的民族危

亡感，从而开始了一场持久而又悲壮的救亡运动。民族救亡、爱国强国成了那个时代的最强音，也成了整个启蒙运动的主旋律。

但必须清醒地看到，中国近代社会大转变的时期也是“门户开放”、“西学东渐”的时期。西方的一些先进思想逐渐传入中国。当时一些先进的思想家一方面撷择中国古代典籍中有利于变革的观点，如《周易》的变易观念、《公羊传》的“三世”观念、《礼运》的大同思想等；一方面参照当时所了解的西方情况提出一些革新的方案。当时梁启超、章太炎通过日本译籍而了解西学，严复则直接介绍了西方近代的一些进步学说。严译的《天演论》介绍了达尔文进化论，在当时风行一时。孙中山则直接接受了西方近代的政治学说的影响而根据国情加以改造，对于中华民族的历史命运起了极大的积极作用。

中国启蒙运动的重要和伟大并不在于它是否取得了如何了不起的成就和胜利，而是在于它曾给人们心灵上所带来的强烈而持久的震撼，并不在于它自身理论的如何完美，而是在于它曾给予，并继续给予人们的启示和思索。许多启蒙思想家们苦苦追问和求索的问题诸如自由与平等、民主与法制、教育与科技、东方与西方、爱国与强国、农业经济与工业生产、儒家伦理与现代文明等等，即使在今天仍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因为启蒙者的思想连同那一次又一次的启蒙运动一起不仅属于历史，它同时更应该属于或必然属于今天和未来。虽然“洋务运动”过去了，“变法维

新”过去了，“辛亥革命”过去了，但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的启蒙运动并没有完结，五四运动便是启蒙精神的继续和发展。在改革开放的今天，在现代化建设的今天，我们一再提倡解放思想，更换脑筋，这又何尝不是启蒙精神在新时代的高扬？

今年是五四运动 75 周年，我们谨以这套丛书来纪念“五四”，也呼唤着新的启蒙精神的到来。

张岱年

1994 年 1 月于北京大学

编 序

王韬，原名利宾，清道光八年十月四日（公元1828年11月10日）生于苏州甫里镇（亦称佘里，在今江苏吴县）。其父王昌桂，字肯堂，一字云亭，为塾师。王韬上有三兄（皆早夭）一姊，下有一弟。1845年，王韬十八岁，以第一入县学，成为秀才。改名瀚，字懒今，一字兰卿。次年，曾参加南京乡试，未中。后来，王韬对科举考试产生厌倦，遂不再投考。

1848年2月，王韬赴上海看望在沪教书的父亲。在这里，他遇到了一些西方传教士，其中有英国伦敦教会的教士、“墨海书馆”的负责人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次年秋天，王韬便应麦都思之请，到“墨海书馆”任中文编辑。在此期间，王韬有机会接触到西学，大大拓宽了眼界，并与著名数学家李善兰、作家蒋敦复、龚橙等成为密友。

王韬在上海“墨海书馆”任职期间，相继爆发了太平天国革命和第二次鸦片战争。对时局极为关注的王韬，曾多次上书清政府地方当局，献“御戎”、“和戎”、“平贼”等策。也许是因为王韬当时尚名微位低，他的这些建议并未

得到当局的重视。在另一方面，王韬也对清政府的腐败无能有了更深刻的认识。1860年，太平军攻破清政府在南京郊外设置的江南大营，并乘胜攻取常州、苏州等地，直逼上海。次年3、4月间，王韬曾陪同艾约瑟（Joseph Edking，英国传教士）等一批外国传教士到当时太平天国的京城南京游历，结识了一些太平天国官员。后来，他借回乡探亲之机，化名黄畹，向太平军苏州地方长官刘肇均上书，建议太平军力争长江上游，停攻或缓攻上海，并希望刘肇均能把他的建议禀呈给正在苏州的太平天国领袖、忠王李秀成。1862年3月，这封题为“上逢天义刘大人禀”的书信在上海附近的王家寺为清军缴获，并被作为极为重要的文件而送往北京总理衙门，清政府遂以“通贼”的罪名通缉王韬。在英国驻华公使卜鲁斯爵士（Sir Frederick Bruce）以及英国驻上海代理领事麦华陀（Walter Henry Medhurst，麦都思之子）、传教士慕维廉（William Muirhead）的庇护下，王韬在英国驻上海领事馆避难数月之后，乘船逃往香港。

1862年10月4日，王韬抵达香港，从此改名为韬，字仲弢，号紫铨，别号天南邈叟。在香港，王韬结识了英国汉学家、英华书院院长理雅各（James Legge），并帮助他翻译《尚书》、《诗经》、《春秋左传》等中国古代经籍。1867年初，理雅各因事回国，遂邀请王韬去苏格兰和他合作，继续译书。是年年底，王韬乘船取道苏伊士、开罗、亚历山大和马赛，到达英国。在英国期间，王韬除了在苏格兰克

拉克曼南郡之多勒帮助理雅各翻译《诗经》、《易经》、《礼记》等中国古籍外，还到英国各地旅行，并在牛津大学发表了汉语演说。他顺便也游历了法、俄等国，结识了儒莲（Stanislas Julien，法国学者）等欧洲汉学家。在旅欧三年期间，王韬亲眼目睹了欧洲资本主义的蓬勃发展，实地考察了欧洲各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发展状况，这种亲身经历对王韬的思想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

1870年，王韬和理雅各回到香港，继续从事了一段翻译工作。同时，又结识了曾经留学美国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容闳和黄胜。1874年1月5日，王韬和黄胜在香港创办了《循环日报》，评论时政，宣传变法自强，成为著名的改良主义政论家，赢得了通晓洋务的名声，受到了丁日昌等洋务派官员的器重。1879年，王韬出游日本。在日本，他既作为学者又作为一个改革家而受到盛情款待，同时也结交了一批日本文人和清政府驻日参赞黄遵宪。1884年，通过丁日昌的关系，得到李鸿章的默许，王韬重新回到上海定居，继续从事新闻事业，成为《申报》的重要撰稿人。稍后，王韬应英国汉学家傅兰雅（John Fryer）和伟烈亚力（Alexander Wylie）的邀请，出任上海格致书院掌院，致力于培养科技人材的教育事业。1897年，王韬因病而死，享年七十岁。

王韬交游甚广，阅历极丰，眼界开阔，知识渊博，平生编译著述不下数十种，题材极为广泛；涉及到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历史、地理、天文历算、小说笔记等等。

据王韬自己说，他还著有一部“多言性理学术”的哲学著作，即《弢园文录内编》，可惜在“辛酉（公元1861年）冬间溺于水中，一字无存”。其实，就王韬的一生来说，他的志趣并不在于形而上学的“性理学术”上，而在于对现实政治生活的批判和参与。重时政而不尚空谈，是王韬思想的重要特色。因此，尽管王韬著述甚广，建树颇多，他仍然是作为一个改良主义政论家而闻名于当世的。

就评论时政而言，其代表作有《重订弢园尺牍》十二卷（在《弢园尺牍》八卷的基础上增编而成）、《弢园尺牍续钞》八卷、《弢园文录外编》十二卷。前两种是王韬与友人的书信集编，其中多谈时务，“往往愤懑郁勃，必尽倾吐而后快，甚至于太息泣下”（《重刻弢园尺牍自序》）；后一种则是王韬自编的文集，“其中多言洋务”，收入的大部分是王韬旅居香港时所写的宣传变法自强的论文，比较集中和系统地反映了他的政治态度和政治思想，同时也反映出了中国近代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政治主张。因此，这部书不仅是王韬政治思想的代表作，而且也在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我们知道，王韬生活的时代，正是中国社会发生重大变革的时代。进入十九世纪以来，中国的封建社会也走向了穷途末路，清王朝用高压手段所维持的相对稳定的统治年代已经一去不可复返。在清王朝内部，政治制度日益腐败，社会经济日益枯竭，阶级矛盾不断激化，社会问题十分严重，清王朝的封建统治不可避免地走向衰亡。与此同

时，以英、法、美、俄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经过长时期的发展，则进一步巩固了其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制度，科学技术和资本主义社会经济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随着国力的强盛，西方列强一方面加紧对国内人民的剥削和压榨，另一方面又积极推行对外侵略扩张政策，不断发动殖民战争，亚、非、拉广大地区，日益沦为西方列强的殖民地。1840年，英国侵略者利用其坚船利炮，悍然发动了侵略中国的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国从此一步步地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法、美、俄、葡等国接踵而至，与英国侵略者一起对中国进行肆意凌辱、瓜分豆剖。面对西方列强的武力侵略和经济掠夺，腐败无能的清政府奉行投降主义政策，一味委曲求全，接连与西方列强签订了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开放口岸，割地赔款，使中国社会陷入了更加黑暗的深渊。

在这种情况下，“救亡图存”成为时代的主旋律。救亡图存的道路有两条：一是革命，一是改良。前者以农民、手工业者等下层劳动人民为主力军，后者则以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及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的有识之士为代表。如果说1851—1864年爆发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从外部给清王朝封建统治者和外国侵略势力以沉重打击的话，那么，十九世纪后半叶兴起的改良主义运动则从内部瓦解了腐朽的清王朝的统治基础，推动了社会历史的向前发展。

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运动是在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登上历史舞台的。就其思想渊源来看，早在三、

四十年代，龚自珍、林则徐、魏源等改革派思想家即已提出“变法自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为后来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开辟了思想道路。但是，由于历史时代的限制，龚自珍、魏源等人还只是朦胧地觉得社会存在着巨大的危机，对于如何变革政治、学习西方也没有明确的系统的认识，他们只是笼统地将政治革新归结为“平人心之积患”（魏源《海国图志叙》），将“师夷长技”归结为学习西方的“养兵练兵之法”和购置制造新式的“坚船利炮”。到了五、六十年代，在镇压太平天国农民革命的腥风血雨中发轫成长起来的洋务运动，虽然也强调“自强”，客观上刺激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生和发展，在思想界引起了巨大的震荡，然究其目的，却是为了借助“坚船利炮”等新式武器来镇压太平天国农民革命，进一步稳固清王朝的封建统治。因此，其所谓“自强之道”，仍在于制器练兵；至于设局开矿，则是为了筹集军饷。沈葆楨在《复奏洋务事宜疏》中曾言：“练兵简器造船为自强之目，筹饷为自强之纲”，这正是对打着“自强”旗号的洋务运动的真实面目的写照。七、八十年代兴起的改良主义，虽然直接脱胎于洋务运动，与洋务思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在其发展过程中，却逐渐脱离了洋务思想原来的方向和轨道，而具有了自己独特的思想特点。改良主义的思想家们，不再局限于洋务派的“船坚炮利”论，而是从富国强兵、抵抗外侮的思想出发，要求更深刻的社会变革。在他们看来，唯有变法才能自强，这种变革不仅包括军事上、经济上的变革，

而且也包括政治上和文化上的变革。这在当时是一种进步的思想，客观上反映了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的要求。

与最初的一批改良主义思想家一样，王韬起先也是洋务派“船坚炮利”方案的主张者和拥护者。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王韬曾写过以“精习枪炮之法”为内容的《操胜要览》，其中说：“今日急务在平贼，平贼在于治兵，治兵必先习西人之所长使之有恃无恐，兵治贼平而已器精用审矣”（《操胜要览·仿制西洋船炮论》），这种思想与洋务派是完全一致的。但在《弢园文录外编》中，王韬的思想则发生了重大变化，他对洋务运动进行了前所未有的批评——这种批评不同于封建顽固派对洋务运动“学习西法”的指责，而是站在新兴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立场上，批评洋务运动对西方的学习是“仅袭皮毛”、“徒具虚名”。王韬一针见血地指出：“今沿海各直省皆设有专局，制枪炮，造舟舰，遴选幼童出洋肄业，自其外观之，非不庞洪彪炳，然惜其尚袭皮毛，有其名而鲜其实也”（《变法下》）；所谓洋务官员，也并非真正通晓西法之人，而是打着办理洋务的旗号，谋求一己之私利，他说：“凡属洋务人员，例可获优缺，擢高官，而每为上游所器重，侧席谘求，其在同僚中，亦以识洋务为荣，嚚嚚然自鸣得意，于是钻营奔竞，几以洋务为终南捷径”，考察其实际行动，则“不过相安于无事耳”，内不能富国强兵，外不能拒敌御侮，“其所称建制船舶，铸造枪炮，开设机器，倡兴矿务”，不过是“铺张扬厉语耳，求其实效，仅得二三”，若任其发展而不思变革，

则“讲论洋务者愈多，办理洋务者愈坏，吾诚未见其可也”（《洋务上》）。

作为亲身游历过西方诸国的有识之士，王韬对于中国当时的落后面貌有着更清醒的认识，他痛切地指出：“当今之时，处今之势，固非闭关自大时也”（《变法自强上》），
“今观中国之所长者无他，曰因循也，苟且也，蒙蔽也，粉饰也，贪罔也，虚矫也；喜贡谀而恶直言，好货财而彼此交征利，其有深思远虑矫然出众者，则必揜不见用；苟以一变之说进，其不哗然逐之者几希！盖进言者必美其词曰：中国人才之众也，土地之广也，甲兵之强也，财力之富也，法度之美也，非西国之所能望其项背也。呜呼！是皆然矣。特彼知人才之众，而不知所以养其人才以为我用；知土地之广，而不知所以治其土地以为我益；知甲兵之强，而不知练其甲兵以为我威；知财力之富，而不知所以裕其财力，开源节流，以出诸无穷而用之不匮；知法度之美，而不知奉公守法，行之维力，不至视作具文。凡此皆其蔽也。”（《变法中》）在王韬看来，要想富国强兵，拒敌御侮，改变落后挨打，备受欺凌的局面，就必须承认自己的落后，踏实学习西法，只有变法才能自强。他说：“至今日而欲办天下事，必自欧洲始。以欧洲诸大国为富强之纲领、制作之枢纽；舍此，无以师其长而成一变之道。中西同有舟，而彼则以轮船；中西同有车，而彼则以火车；中西同有驿递，而彼则以电音；中西同有火器，而彼之枪炮独精；中西同有备御，而彼之炮台水雷独擅其胜；中西同有陆兵水师，而

彼之兵法独长。其他则彼之所考察，为我之所未知；彼之所讲求，为我之所不及；如是者直不可以俚指数。设我国至此时而不一变，安能埒于欧洲诸大国而与之比权量力也哉！”（《变法中》）因此，王韬极言变法之急迫，他说“至今日而言治，非一变不为功”（同上）。针对封建顽固派的攻击，王韬引用《周易》的话说：“穷则变，变则通。知天下事未有久而不变者也”（同上），甚至说：“孔子而处于今日，亦不得不一变”（《变法上》），反映了变法自强的历史必然性。

作为中国近代早期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王韬所要求的社会变革是深刻的和多方面的。在政治制度方面，王韬批判了腐朽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在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君主立宪制的政治主张。他把国家制度分为三种：“一曰君主之国，一曰民主之国，一曰君民共主之国”（《重民下》）。在他看来，君为主则权倾于上，遂致上下隔阂，有所蒙蔽；民为主则权倾于下，不免法制纷更，心志离散；“惟君民共治，上下相通，民隐得以上达，君惠亦得以下逮”（同上），才是最理想的政治制度。这种思想虽有与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相妥协的一面，但毕竟在承认“君主”的前提下给“民主”留下了余地，甚至认为“天下之治，以民为先”（《重民上》），这在当时是一种极其大胆的思想，反映了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要求，具有进步的历史意义。

在社会经济方面，王韬批评了“重农轻商”的传统思

想，他在不轻视农业生产的前提下，积极主张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在他看来，“富强即治之本也”，“舍富强而言治民，是不知为政者也”（《兴利》）；而富强之道，即在于“大力扶植和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所谓‘商富即国富’”。因此，他主张“辟车路以通平陆，设电线以速邮传，开矿务以采煤铁五金，铸钱圆以便商民、足国用，行西北屯田之法以实营伍、赡额兵，制机器以兴织造，许民间用轮船以达内河，立公司以贸易于外洋”（《除弊》），希望能“以商力濬利源，与西商并驾齐驱而潜夺其权”（《治中》）。应当说，这些建议不仅符合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而且也符合富国强兵、抵抗外侮的现实需要。

在军事方面，王韬不满足于洋务派狭隘的“船坚炮利”论，而主张造械制器与练兵方法的全面革新。他说：“夫枪炮则在施放之巧，舟舰则在驾驶之能，行阵之器固不可不利，而所以用利器则在人也”，“今日练兵若不以西法从事，则火舰火器亦徒虚设耳”（《变法下》）。因此，他主张“改营规，易军制，汰兵额，异器械”，“不独水师当变，即陆军亦当变也；不独绿营当变，即旗丁满兵亦当变也”（同上）。除此之外，他还特别强调“须于长江水师之外，专设海军”（同上），以巩固海防。这些建议对于提高军队的战斗力以防敌御侮，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文化教育方面，王韬坚决主张废除愚昧落后的科举取士制度，而代之以经世致用的器艺实学。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以八股时文为标准的科举制度，不但不能选拔真才，

而且还“败坏人才，斫丧人才，使天下无真才，以至人才不能古若”（《原才》），因此，“不废时文，人才终不能古若，而西法终不能行，洋务终不能明，国家富强之效终不能几”（《洋务下》）。在王韬看来，“天下非无人才，患在取才之法未善，用才之志不专，又患在上之人不能灼知真才”（《原才》），因此，欲得真才，“取士之法宜变也”（《变法中》），“必去时文尚实学，乃足以见天下之真才”（《原士》）。所谓“实学”，即是以西方的科学技术为主要内容的经世致用之学。王韬指出，“设以学时文之精神才力专注于器艺学术，~~即不能~~，而终有一技之长，一材之擅，足以~~以见用之而有余者~~”（同上）。

在外交方面，王韬对“~~请款前~~”~~求~~不遂，请无不行”的投降主义政策进行了批判。他指出，“夫在今日非无通悉洋务之人，其在上者~~亦未尝不生惜太甚~~，无如身家之念重，利禄之情深，~~临事不敢担其责~~，惟虚与之委蛇而已”（《设领事》）。王韬强调，在对外交往上不能一味地委曲求全，而要不卑不亢，坚持原则，他说：“洋务亦易明耳，不外乎以情喻之，以理折之而已。事有可行则许之，事不可行则明告之，务期于必信必速，毋卑毋亢。苟自问情无可疑，事无不直，则虽因此以得罪，亦无所憾。……苟徒以委曲周旋，逢迎接纳，以为弥缝之至道，羈縻之长策，则吾未见其可也”（同上）。同时，王韬也清醒地认识到，“睦邻之道无他；首在自强”，“惟能自强，则遣使臣、设领事，一切皆有实用；否则，亦不过以虚文相縻而已”（同上）。总